

► 井冈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红土情”学术丛书 ◀

主编◎ 刘晓鑫 龚奎林



艺术终结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丹托

YISHUZHONGJIELUNPIPAN CONGHEIGEER DAO DANTUO

何建良◎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井冈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红土情”学术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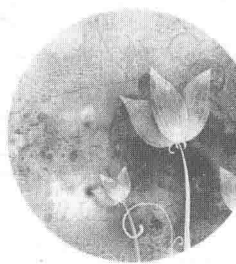
主编◎刘晓鑫 龚奎林

艺术终结论批判

——从黑格尔到丹托

YISHUZHONGJIELUNPIPAN CONGHEIGEER DAO DANTUO

何建良◎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何建良著.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7-210-09365-7

I. ①艺… II. ①何… III. ①艺术评论—研究 IV. ①J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642号

艺术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

何建良 著

责任编辑:涂如兰

书籍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75

字数:200千字

ISBN 978-7-210-09365-7

定价:66.00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7—86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红土情”学术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晓鑫 龚奎林

编 委：邓声国 肖 文 刘云兰 赵庆超

廖伦忠 何建良 汪剑豪

专著篇目：

龚奎林：《新世纪诗歌的叙事与抒情》

廖伦忠：《江西新时期戏剧研究》

何建良：《艺术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

刘云兰：《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叙事发展与嬗变》

汪剑豪：《根与岸——新时期文学写作中的身份认同影响研究》

赵庆超 霍巧莲：《聊斋小说的当代电影改编研究》

缘起

缘起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于1958年建立，作为井冈山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几代学者在这块红土地上辛勤耕耘、默默求索，为井大整体实力的提升和人才培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今中文系已有教师52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35人，博士19人，2010年以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10项，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江西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江西省高校品牌专业，2015年在全省首次举行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评价评比中获得全省第四，“庐陵文化研究中心”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文系教师有工作上的热情踏实、育人上的无私奉献和研究上的执着追求，虽然远离中心城市，但一直努力向学术中心挺进，在紧张繁忙的教书育人之余，笔耕不辍，将自己对文学的思考、对红土的热爱、对现实的观察融入学术论著中，遂成汉语言文学“红土情”学术丛书。丛书共六部专著，作者龚奎林、廖伦忠、赵庆超、汪剑豪和何建良、刘云兰分别为井冈山大学校重点建设二级学科“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学科骨干，一直致力于文学与现实的书写，该丛书出版也得到两个学科的经费资助，更得到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颜敏教授的嘉勉和期许。

结伴同行

『红土情』学术丛书序

◎ 颜敏

结伴同行

——“红土情”
学术丛书序

1

中国人喜欢讲缘分。人与人或人与事的偶合相遇，皆由因缘，而因缘又往往为冥冥之中的命运注定。我与井冈山大学中文系的这批年青学者交往，就是一种缘分。当然，这主要是学缘：或者与他们曾经的导师相识，或者原本就是校友，因而一见如故。套用张爱玲的话说，在时间的荒野和茫茫人海中相遇相识，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由于与这些年轻朋友的交往，又与他们撰写的“红土情”学术丛书结缘。谁都知道开卷有益，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人与书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在目前这种无法拒绝的电子媒体笼罩的生活方式与难以逃脱的急功近利的工作情境下，阅读竟然成为一种奢侈的精神爱好，连一些早就想读的好书，我们似乎都无暇顾及。每次在书店里望着那些刚上架的新书，我都能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压迫感。即使是家中的学术藏书，我也只能选择性地阅读，那些不是急需阅读的只能委屈它们，静静地躺在书橱里，也许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终归与我无缘。因此，感谢井冈山大学年轻朋友的信任，嘱我写序，让我有幸与这套丛书结缘。

井冈山大学中文系编撰的这套“红土情”学术丛书共有六本，基本涵盖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方向：诗歌研究有龚奎林的《新世纪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小说研究有汪剑豪的《根与岸：新时期文学写作中的身份认同影响研究》和刘云兰的《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叙事发展与嬗变》，戏剧研究是廖伦忠的《江西新时期戏剧研究》，影视文学研究是赵庆超、霍巧莲的《聊斋小说的当代电影改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则是何建良的《艺术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从这套学术丛书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学术团队当代文学学科的专业方向齐全，学术成果丰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贴近当代文学前沿，研究视角独特，拥有显在的地域文学特色。下面，具体地谈谈这套丛书的这三个特色。

首先，这套丛书的选题紧贴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具有学术挑战性。一般而论，当代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前两个时段的文学可以纳入研究领域，最后一个时段的文学基本上还处于批评领域。因此，研究成果若想出新，研究领域的选题往往需要另辟蹊径，以免雷同；而批评领域的选题则需要独具慧眼，以经时间的淘洗。我注意到，这套以当代文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丛书，力求创新，因而选题颇有讲究。

龚奎林的《新世纪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直接切入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以同代人的身份阐释新世纪的诗歌创作，因而具有学术挑战性。这部专著的主要特色在于，对于新世纪诗歌创作既有宏观的描述和思考，又有微观的细读与阐释。具体地说，它一方面将新世纪的诗歌创作置于新世纪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加以审视，力图整体把握和深入探讨新世纪诗歌的艺术形态及其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具体作家的个案分析与作品的文本细读，阐释新世纪诗歌的思想意蕴及其艺术特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著者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点，选择他熟悉的江西、广东与四川三地的新世纪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分析，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寻绎新世纪地

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此外，龚奎林本人热衷诗歌创作，属于两栖性的批评家。诗歌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使这部专著充溢鲜活的生命体验与独到的人生思索。从这部专著中我们发现，在这个诗性缺失的年代，诗人仍然以诗性的目光和心灵审视与体验这个纷乱的生活世界；他们以独特的言说方式，顽强地抗衡这个时代实用理性和平庸生活的对个体生命的侵蚀。

赵庆超、霍巧莲的《聊斋小说的当代电影改编研究》是个独特而又有趣的选题。《聊斋志异》原本就是一部奇书，它是文人以虚构的方式讲述民间社会的鬼狐传说故事，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如果说民间传说是一度创作，而蒲松龄是二度创作，那么电影改编便是三度创作。而且，聊斋鬼狐小说的电影改编还涉及不同时空；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直接影响电影改编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因此，传统鬼狐文化的原型意象经过不断书写以及从文字到影像的表意符号的转换，不仅形成一个关于鬼狐叙事祛魅与赋魅的复杂文化谱系，而且构成一个独特而多元的互文性的话语空间。探寻这个丰饶的互文性话语空间，既可触摸到民间社会传统鬼神文化的原始旨意，也可透视不同时空中的叙事者对鬼神文化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还可梳理出电影文学改编过程中对原著吸收、戏仿和批评的一些内在性规律。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2]我认同鲁迅先生的看法，《聊斋志异》的鬼狐叙事不但蕴藏着民间社会的神秘文化特质，而且隐含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因而值得反复阐释与深入辨析。

其次，这套丛书的研究视角比较独特，富有新意。由于我也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2]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曾是“知青”，不但平时留意“知青”运动研究，^[1]而且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因而特别关注汪剑豪的《根与岸：新时期文学写作中的身份认同影响研究》。“知青”运动不仅在现代中国，而且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现象，因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显在标志是城市化，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是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徙，只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度将城市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迁往农村。因而“知青”人生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独特人生。当“知青”作家将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诉诸笔端，在极端的生存境遇中反思社会、思索人生与体验生命，便形成所谓的“知青文学”。由于“知青”生活不但关涉一代青年，而且牵涉城镇中的绝大多数家庭，因而“知青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拥有较大影响的创作思潮。事实上，“知青”作家不仅是当年最有活力的一个创作群体，而且也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富创作实力的创作群体，如王安忆、韩少功、李锐、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阿城、叶辛、何立伟等等，都是新时期一线的实力作家。

不过，“知青文学”也是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一方面“知青文学”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融合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思潮，而创作主体对于“知青”运动有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知青”运动的高潮发生在“文革”时期，创作主体对于“文革”的认识也有个深化的过程。因此“知青文学”整体上显得较为复杂。“知青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几乎与“知青文学”同步，但是80年代大多数批评家和研究者与创作主体一样，有过刻骨铭心的“知青”体验，虽然批评主体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作品意蕴，但在审美过程中却难以摆脱与作家相同的情感价值倾向，从而影响审美判断的公正性与超越性。因此，

[1] 所谓的“知青”运动，是指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知青”运动开始于50年代，但是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则是“文革”期间，共有近2000万的城镇知识青年先后下放农村。

新一代学者对“知青文学”的研究，便显现出特有的学术价值。

汪剑豪作为新一代学者，对“知青文学”有他个人的独特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选择了身份认同这个审美视域。他从身份认同视角切入“知青文学”，辨析创作主体流露的自我认同危机，深刻揭示出“知青”一代对自身既是“文革”参与者又是受害者这双重身份的体认问题。应该说，“知青”是自我分裂的一代，实际上他们从自命不凡的“红卫兵”到落入底层的“知青”，便丧失了生命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但在新时期初期，他们还无法直面自己尴尬的身份和分裂的自我。与众不同的是，这部专著将路遥这类回乡知识青年的创作纳入“知青文学”的视野。路遥一直是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的偶像，他创作中乡村子弟自强不息的精神及其悲情意识，深深触动无数文学青年的心灵。尽管以路遥为代表的回乡“知青”没有城镇“知青”的城市生活记忆，但是中学生活与现代教育已经让他们生活在别处，而且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根系乡土的身份意识让他们耿耿于怀。此外，专著还试图辨析播撒在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思潮中的“知青文学”身份认同的碎片。当然这以“寻根文学”最为明显，因为文化寻根毕竟以“知青”作家为主。简言之，相对于既有的“知青文学”研究，这部专著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

何建良《艺术终结论批判：从黑格尔到丹托》的研究视角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命题原本就是一个沉重的文学话题。这部专著以艺术终结论为中心，按照创作主体论的脉络将这个命题贯穿浪漫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并以黑格尔、阿多诺、丹托分别作为这三种不同艺术终结论的代表人物。专著通过“历史叙事”的方法，以“哲学——历史——艺术”有机统一的视角深入到黑格尔、阿多诺与丹托的具体语境及其文本，分析艺术终结的缘起与不同内涵，进而给予批判性反思。

我赞同著者的观点和思路，人类与艺术同在。我们早就听厌

了黑格尔僭越式的历史预言，因而与其探讨当代艺术是否凤凰涅槃这个问题，还不如追问从黑格尔到丹托他们为什么提出并如何思考这个命题。通过历史的梳理和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深入和人类生存方式与生活观念的不断变化，现代西方对艺术形态、意义以及地位的认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关于艺术的界定是开放的，那么新的艺术形态及其文化意义的变化，以及它们的价值地位在现实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位移，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呢？说到底，隐含在艺术终结论的深层问题，还是西方现代社会关于个体生命境遇的终极追问，关于主体性的自我焦虑。

最后，这套丛书的作者具有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学研究特色。比较文学“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命题，同样适用于地域文学研究。最能体现这种特色的是廖伦忠的《江西新时期戏剧研究》。廖伦忠一直关注江西地方戏剧的创作，积累深厚。这部专著选取江西新时期以来 8 位作家的 12 部代表性作品进行研究评论，旨在探寻江西新时期戏剧繁荣的内外因素，以期对以后江西戏剧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有所启示。其实，这部专著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悖论性问题。一方面江西地方戏剧创作取得不菲的业绩。据统计，新时期以来江西本土剧作家创作的戏剧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田汉剧本奖等重要奖项 20 余项，出现了《山歌情》《榨油坊风情》《远山》等蜚声全国的著名剧目，涌现了罗日铨、颜梅魁、姜朝皋、谢干文、胡桔根等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剧作家。另一方面，江西地方戏剧创作在当代艺术史上的文学地位并不如意。这里固然有江西地方剧种在全国地方剧种中的地位与影响问题，如赣剧、采茶剧等地方剧种，即使在省内观众也较少，社会影响不大。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体制化的艺术生产方式。坦率地说，这些作品的创作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冲击国家级奖项，而

没有探索如何在主流话语认同与社会观众需要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更多的是圈子内的影响，而没有产生较大的社会文化效应。一种传统的艺术形态如果失去了现实社会的青年观众，那么与艺术博物馆里的古董有何差异呢？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越来越引发学界的关注，这是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理论共同促进的结果，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形变的产物——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抑或文学教育，女性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众多女性文学研究的专著中，刘云兰的《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叙事发展与嬗变》特点在于，它采用了女性文学的整体研究与江西女性文学的局部研究相结合、宏观论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体例：一是从宏观的角度阐述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与转型现象；二是阐述江西女性文学的审美内蕴、诗性气质及地域文化特征，以此窥见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本质；三是选取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时间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进行个体研究，分析其创作的特点，评判其作品的优劣，以此来反观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得失。其中江西女性创作研究，时有独到见解。

应该说，当代文学专业在整个中国文学学科中，相对而言还是紧贴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的，但是即便如此，文学还是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有效地介入和影响现实社会，从这个角度讲艺术终结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现实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尽可能地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应如何顺应现代社会专业化的趋势，在寂寞的阅读与思考、教学与研究中实现自我价值，是摆在我们这些文学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难题。

与前辈的学者相比，我们固然少了一份雄心，但却多了一份从容。毕竟高校知识分子在弘扬大学精神与坚守学术规范上业已达成共识，而学术专著就是传承大学精神与践行学术规范的具体体现。因此，井冈山大学中文系编撰的这套“红土情”学术丛书，

以及隐含在丛书背后的坚韧的人文精神与职业伦理道德，对我来说是一种有力的鞭策。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我愿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一道，相互砥砺，结伴同行。

2016年8月10日

艺术终结论
批判

从黑格尔到丹托

目录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 / 46

第一节 艺术终结的理论背景 / 48

第二节 古典艺术的解体 / 61

第三节 市民社会的表征 / 73

第二章 阿多诺艺术终结论 / 89

第一节 艺术终结的文化背景 / 90

第二节 艺术“物化”与文化批判 / 103

第三节 艺术困境与反艺术 / 116

第三章 丹托艺术终结论 / 130

第一节 艺术终结的艺术背景 / 131

第二节 哲学对艺术的剥夺 / 141

第三节 艺术史的终结 / 153

第四章 艺术终结：一种来自“历史叙事”的批判 / 168

第一节 艺术与哲学关系的历史之思 / 170

第二节 艺术的历史与历史中的艺术 / 200

结语 / 228

参考书目 / 234

后记 / 250

艺术终结论

批判

→→→→→→→→→→
从黑格尔到丹托

艺术终结研究：现状与问题

导 论

“在当代欧美的艺术界和美学界，‘艺术死亡了’‘艺术的终结’‘艺术史结束了’……这样的‘众声喧哗’，总是不绝于耳、绵绵不断。”^[1]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像一棵棵小小的飞弹，不仅打进了书刊、报端等各种媒体，而且打进了文学艺术的圣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的惊悸和恐慌。”^[2]可以说，“艺术终结”已成了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艺术为什么会终结以及艺术终结意味着什么就成了人们必须反思的核心问题！

客观地说，“艺术终结”是一个“舶来品”。追本溯源，人们一般把“艺术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看作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与美学家黑格尔，他在1828年的柏林美学讲演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话题。

[1] 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 李衍柱：《艺术的黄昏与黎明》，载《东方论坛》2004年第4期。

黑格尔认为艺术发展到“浪漫型艺术就到了它的发展的终点，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一般都变成偶然的，而这两方面又是彼此割裂的。由于这种情况，艺术就否定了它自己，就显示出意识有必要找出比艺术更高的形式去掌握真实。”^[1] 黑格尔的这种“艺术终结”论是不是意味艺术必然要消亡，引发了人们的争论。早在 1830 年黑格尔去世的前一年，克里斯琴·赫尔曼·魏瑟在他的著作中对黑格尔所说的艺术最终将被哲学所替代的预言补充了一个冗长而又带争论性质的注解，认为黑格尔的这一预言不会实现，德国艺术不是日落西山的夕阳，而是黎明前的曙光。八年之后，魏瑟再次批评了黑格尔的某些追随者对艺术消亡命题的谈论，并补充说，这很难认为是黑格尔本人的看法。韦斯用黑格尔著作本身来证明所谓艺术消亡的说法在黑格尔美学中并不存在，而只是那些听过黑格尔美学讲演的人随便谈论中提到这个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黑格尔并没有说过“艺术消亡”。克罗齐在他的《美学》中曾诙谐地把黑格尔这一命题称之为“葬礼言说”。赫尔曼·格洛克纳则责难黑格尔“在理念的发展上对艺术看法太‘凝固’”，并认为黑格尔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因为艺术并非一种不完善的哲学。西奥多·利特的看法与格洛克纳相似，他认为艺术是独立自主的，因此不会在一种较高阶段的辩证综合中被排除掉。格尔德·沃兰德虽然认可黑格尔所主张的艺术是精神发展新阶段的看法，但认为黑格尔仅仅从意识发展的观点上看待文化，因此整体上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又完全承认当代西方艺术确实出现了危机。吕迪格·布勃纳也说过同样的话：“哲学取代艺术并使它成为绝对精神发展史中一个已经过去了的阶段”。^[2] 总之，人们就黑格尔的艺术终结是

[1]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288 页。

[2] 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10-512 页。